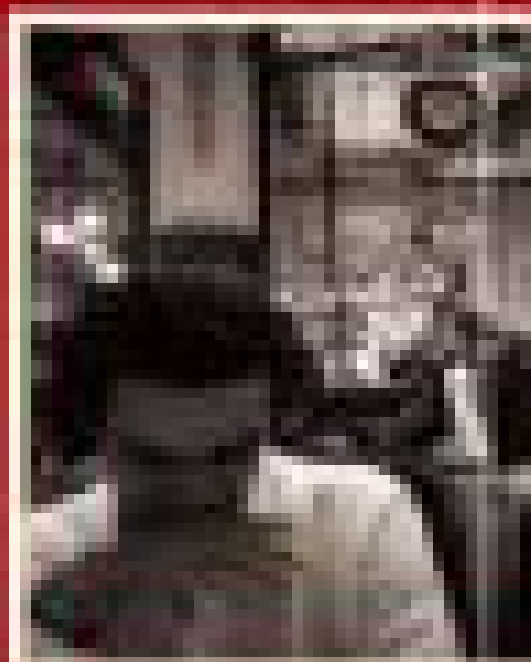


Paris

巴黎情事 ■ ■ ■

一个城市和一个人的关系，要看在那个城市有没有一个可以想念的人。



人们说，她是个寂寞的女人，她说她自己是文艺界里的寂寞，恰好成了作第一个城市和一个人的关系，要看在那个城市有没有一个可以想念的人。

她说她是个寂寞的女人，她说她自己是文艺界里的寂寞，恰好成了作第一个城市和一个人的关系，要看在那个城市有没有一个可以想念的人。

Paris



目录

Content

- [第一节 巴黎之约](#)
- [第二节 莫里亚克](#)
- [第三节 小说中的那页](#)
- [第四节 巴黎我来了](#)
- [第五节 美食美事](#)
- [第一节 小凡的画室](#)
- [第二节 和艺术家闲聊](#)
- [第三节 所谓艺术家](#)
- [第四节 乱世出英雄](#)
- [第五节 帅哥燕青做导游](#)
- [第一节 活人墓园和江南的恐怖](#)
- [第二节 他和她，还有起司先生](#)
- [第三节 巴黎的慵懒](#)
- [第四节 卢浮宫，罗丹博物馆，薇薇安穿堂](#)
- [第五节 女人的性梦](#)

第一节 巴黎之约

在我决定赴摩尔的巴黎之约后，香港的律师朋友蚂蚁把一本海明威的叙事散文《巴黎的盛宴》带到北京送给我。

1957年的秋天，海明威在古巴开始写这本书，讲述关于1921年至1926年他和第一任妻子在巴黎的那段岁月。那是早年的巴黎，海明威很穷但很快乐的日子。

我从来没有特别留意过巴黎，对于我，它是一个遥远的存在。越是著名，越是随时会有关于它的文字画片出现，我越没有好奇心。一个城市和一个人有没有关系，要看在那个城市有没有一个可以惦念的人。

一旦有那样一个人出现，那个城市便会突然与你产生关联。

你想起它，便想起了一些真实的色彩，气味，形象。

不再是电影里的，或者明信片带来的影像。

摩尔在一年多前第一次来到中国，那是夏天的一个夜晚，他在北京出现，他是一名记者，出过一本书，里面有他拍的照片，文字则是关于他记录的眼里所看到的印度、越南、日本和中国。

那天在北京的一个演唱会后，他和我同时出现在演出单位举办的酒会中。他和一帮驻京的老法记者朋友们在一起，那是他待在北京的最后一晚，第二天他要去上海，然后从上海回巴黎。

那天晚上，我兴高采烈，旁边一群老朋友，在自己的地盘上，甚至举办演出参加演出的都是自己人，我只是去捧场，衣着鲜亮，夏季的夜晚是明媚的，我也是明媚的：红色的吊带裙，镶着淡绿仿古的金色碎花边。每个人都在笑，生活在此刻非常美好。

我喝了很多酒，并且很快就开始散发酒意。那是我最有诱惑力的时候，我知道一个放松的、喝酒喝到恰到好处眯着眼睛脸带红晕甜甜笑着的女人有多可爱。

老法堆里的男人和女人都在向我们的中国堆靠拢，一个漂亮的法国女孩儿抱紧我，我也抱紧她，我们很快抱在一起，喝过酒了的人们凑过来看这两个醉意弥漫的小女人。

我们说了很多话，用第三个国家的语言，我忘了我们究竟说了一些什么，只知道气氛融洽。那个夏夜春意弥漫，那个酒吧叫“鹅和鸭”，摩尔就在那个人堆里出现，他年轻，清秀，腼腆，褐色的卷发，奶白色的皮肤。他一直在找话和我说，并且用一种害羞的眼神微笑地看着我，而我送了一个中文名字给他，后来他一直用着那个名字，在巴黎的工作名片上也可以看到。

他知道我是一个写作的女人，这是他们报社另外一个记者向他通报的。

他们报社驻京的一个记者告诉我，摩尔的祖父是个很有名的作家。

后来他给我写信，从信箱的名称看得出他的全名。

莫里亚克，那个我喜欢的法国作家原来是他的祖父。

我不再怀疑，那份眼熟是有原因的。

他走近我，身上带着我喜欢的一个作家的气味。

我感到隐隐的熟悉和吸引，原来那是来自他血管深处另外一人的血脉。

不止一人和我说起过他：莫里亚克。

他那样的作家让人害怕提起，他所怀有的感情让人战栗。

在我的手边，经常有一本赤豆红色封面上有莫里亚克像的诺贝尔文学丛书之《爱的荒漠》。我经常把它打开，在我短暂而又漫长的婚姻生活中，我把它一读再读，那些文字娓娓善诱，引我一次次放纵自己的心灵和想象，那既是一次次惊心动魄的阅读，又仿佛是点着蜡烛切蛋糕，在春天的冰面上进行生日派对。

除了弗朗索瓦·莫里亚克，还有谁能够如此美丽如此危险？

我不知道。

他出生在盛产葡萄酒的法国西南部城市波尔多（我没想到有一天我会去那里，住在他待过的一栋房子里，当然他的房间都保留着，已经成为当地著名的陈列馆了），他的父亲很早便去世了，他深得母亲疼爱，他从小就喜欢读书写作。而且，受到家庭浓厚的天主教氛围影响，莫里亚克对笔下的芸芸众生一直充满了怜惜，甚至是有罪的人，他都不肯加以惩罚鞭挞。这样的作家往往是病态的，他们的小说只需读上一遍，就刻骨铭心地印到你脑海里去了，像微暗的火，慢慢喘息摇曳着，把你深深灼痛。陀思妥耶夫斯基、格雷厄姆·格林、伊夫林·沃都是这一类的小说家，相比起来，莫里亚克对于绝望心理的描述最为细腻诚挚。

第二节 莫里亚克

初读莫里亚克，是部中篇小说《母亲大人》，描写了畸形的母爱给儿女造成的伤害，简直就像《孔雀东南飞》的外文版。当时我的感受是太可怕了，他竟敢这样讲故事，完全不合常理。故事开始的时候，刚刚流产的玛蒂尔德高烧不退，睁大眼睛凝视着天花板上不停晃动的光晕，丈夫跟随严厉的婆婆出去了，把她单独留在了那间嘈杂的小楼之内。莫里亚克的听觉感官十分敏锐，我们可以从短暂的第一小节当中读到绿色杯子的颤动、蟋蟀的鸣唱、火车隆隆地行驶过河上的铁桥、树枝沙沙的响声，甚至连窗外的山梅花香和煤烟的气味都被暮春的夜风给吹送进来了。可怜的玛蒂尔德昏睡才醒，冷得直打寒战，却没有人来陪伴。她只能够跟一条唤作贝利乌的狗交谈，叫喊佣人的铃绳悠来荡去，然而安装在这幢漆黑古老的住宅里的闹铃，却始终一言不发。丈夫时刻处在婆婆的严密监控之下，玛蒂尔德回想起他们订亲那天，她那身材高大的婆婆站在小客厅的平台上对着玛蒂尔德怒吼，你别想占有我儿，你永远别想把我儿从身边夺走。

再读莫里亚克，就是收录在《爱的荒漠》一书中的《黛莱丝·德克鲁》。

莫里亚克劈头盖脸地写道：“黛莱丝，许多人将会说你没有在世上活过。”这叫什么话，她到底犯了什么罪过？语气就跟纪念鲁迅的诗歌《有的人》似的，“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当故事里的女主角决心用毒药害死丈夫时，我不禁倒吸了一口冷气，终于相信了杜拉斯的那句名言：“你把我给毁了，这对我有好处。”

我最喜欢的永远是《爱的沙漠》，它是我写《等待30岁的来临》那篇小说的动机。

发表于1925年的这部长篇获得了法兰西学院小说大奖，也为日后莫里亚克赢得1952年诺贝尔文学奖桂冠奠定了坚实基础。当故事讲述

到第六页的时候，忘记带口红的女主角玛丽亚·克鲁斯登场了，那是一家充斥了爵士乐、吊扇杂音和嗡嗡作响的曼陀林琴声的狭小酒吧间。

雷蒙·库莱热——一个医生的儿子，他怨恨自己的父亲。他坐在鸡尾酒面前，静候她的到来。莫里亚克的描述非常生动具体，对人物内心的揭示更是细致入微，他把风韵犹存的孀妇玛丽亚比喻成童年时代走过的一条路，即使覆盖它的栎树已被砍光，仍然清晰可辨。于是，我们看到了玛丽亚那双又大又安详的眼睛和宽阔的前额，听到了雷蒙“我18岁的时候她27岁”的伤心自白，也读懂了一个少男的青春热恋。小说缓缓地展开了倒叙，雷蒙是搭乘有轨电车上学回家的，“有轨电车像活动的焰火”，瞬间照亮了住宅四周的紫杉和千金榆，空中漂浮着朽木和树叶的气味，这段路程是他获得自由解放的时间。他们就在车上邂逅相知。然而，他不应该爱上这个危险的女人，因为他是库莱热大夫的儿子，父子俩怎么可以同时喜欢一个不安分的寡妇呢？莫里亚克很会折磨他笔下的主人公。故事的结尾，雷蒙穿过凄凉的塞纳河，走上发车站台，送别自己的父亲。老人正慈爱地凝视着他，并且在始终不肯结婚的儿子身上找到了自己逝去生命的一部分。

有一天我读到莫里亚克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提到了那个“前天夜里”，他通过收音机听到了《爱的沙漠》的改编剧。尽管原著受到了曲解，但作家还是一下就认出了库莱热大夫、雷蒙和他们共有的情人玛丽亚。大师深情地对记者谈道：“这个小小的世界，30年前就离开我了，可又在说话，在我面前受难。”

第三节 小说中的那页

我想寻找这样一个打动了我的异国的作家，顺着他的轨迹，我找到他了，为什么他已远去？

既然我们有缘，终于有一天，我找到了一条接近他的线索，可为什么他已早早离去，徒留我凭吊他生前的足迹？

我要带着收录《等待30岁的来临》的我的中短篇小说集去找他。尽管他看不懂中文，但我会把书翻到写有莫里亚克这个名字和《爱的荒漠》一书的那一页，给他看，现在他不在了，我只有给他的孙子看，摩尔也看不懂，但是我告诉他那是属于他们的名字。

在婚后的三年中，我始终在看一本书，始终没有看完。法国作家莫里亚克的《爱的荒漠》，这本书在1952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我喜欢这个男人使用的那些句子，例如：“肉体上的乐趣和厌恶就像闪电和霹雳一样交织，闪烁袭击。她的身体使用过度，带着低贱的自我磨损的痕迹。没有欲望，只是一种肮脏的习惯。她睡觉没有呼吸，仿佛已在睡眠中死去。我需要独自待一会儿，你明白，我必须独自待着……”

这个故事好像很简单又很复杂，一个35岁的男人雷蒙在酒吧间遇到17年前爱过又伤过他心的女人玛丽亚·克罗丝，当年她27岁，他还是一个18岁的中学生。当年，雷蒙和克罗丝经常在电车上遇到，一个成熟妇人的目光使一个肮脏的中学生身上出现了一个新人，犹如第一铲土使完美的雕塑部分地露出了地面。他开始早起，梳头发，烫裤子，还涂手指甲，妄图吸引那个每天注视他的电车上的女人。而刚刚丧子的克罗丝此时也正吸引着男孩儿的医生父亲，漫长的婚后生活使医生仿佛身处荒漠，他迷上了克罗丝，但又羞于表达，他情愿常常地坐在她那挂着布帋和毯子的厅里等待她或候在她的身边注视这个女人沉浸在自己思想中的容颜。她把医生放在神父的位置，对他倾吐心声，给

他写信，但是对他本人无动于衷，从来不放在心上。他对她仿佛是毫无价值的存在。

医生因爱煎熬，但他却不知道他的孩子就是他的情敌，这个好像处在突如其来的春天中的男孩儿雷蒙。男孩儿让克罗丝迷恋，她开始让男孩儿来家中探望她，但是当男孩儿真的想对她动真的时候，妇人却出于奇怪的心理，怕纯洁的男孩因此而改变对自己的看法。她拒绝了男孩儿，赶他出门，自己却差点儿从楼上跌下致死。

17年后，经历无数女人，一心想再见到克罗丝时报复她、让她难堪的雷蒙真的见到故人。她明显老了，但额头仍然发亮，闪着智慧的光，眼睛明亮，如同以前那样清澈。仿佛回到过去，他根本无法对她使坏，反而替她把醉酒的丈夫扶回旅馆，还叫来他那失去联系多年的老父亲来替她的丈夫看病。

过往的烟云终于是过去了的，对这对父子来说都像一个谜似的女人——玛丽亚·克罗丝仿佛已将过去完全忘记。我喜欢这个女人的善变和冷静。人人都形同沙漠，父亲一辈子也不能了解儿子，妻子一生也不能走近丈夫的内心，而雷蒙也永远不能了解克罗丝的心，到最后他还盼望着能得到一丝温情，老了的克罗丝却只是剩下驱赶他留下的香烟味道的那个手势和动作。

爱究竟是什么？我始终在看这本书，只有法国人才会那么的循循善诱，我开始对我自己的生活产生了疑问，我开始问自己：谁是我睡时和醒来时想到的第一个人？答案常常有很多，但都不是小顾，我开始有了坏脾气，又有了一张被坏脾气和不满意宠坏和摧残的脸。也许应该对什么人都视而不见。见到我这样表情的人是不幸的。

……摩尔是老人四个儿女中最小儿子的孩子，小儿子是莫里亚克的最宠。我甚至怀疑摩尔的父亲就是《爱的荒漠》一书中那个儿子雷蒙的原型，因为他很晚结婚，摩尔说他的父亲和母亲年龄相差很大，父亲四十几岁才结婚并有了他和妹妹。

我认识的这个人，身上流着莫里亚克的血？

这一点很长时间让我感觉神奇。

我的欧洲之旅在那时开始有了影子。

当摩尔问我几时会去巴黎的时候，巴黎离我不再遥远。

第四节 巴黎我来了

旅行就要开始，这是一趟计划已久的旅行，我机票早已订好了，也买了欧洲五国的经济通票。这些保证了我在两个月时间内有任意的六天可以坐在欧洲之星或者其他特快列车的一等舱里在法国、德国、西班牙、瑞士和意大利间自由来去。

我换好了欧元，带足了美元，朋友们要我把钱存入卡，我却还是把它们贴身放入一个小包包里。

摩尔已经准备好休假，他在伊妹儿里说等我到了，他就带我去波尔多，他的祖父莫里亚克生活过的地方，那里成了他的纪念地。从巴黎坐火车到波尔多，再从波尔多开车到郎贡，一路上会看见无数的桥、森林、古堡和教堂，我们还可以去海边，那里有古老的餐馆，我们可以在餐馆的大花园里赏心悦目地品尝美食——他等着和我一起去度假。

这一年多来，因为我传出要去巴黎了，我们才通信。但是我记得他的清秀和腼腆样子，他们报社的人和我通信，有时会突然在信末来一句：“摩尔昨天问起你，正好我告诉他我们白天见面了。”我一向对老外没有感觉，可是对他，感觉还行，是可以接受他的安排，放心地跟他去度假去了解巴黎的心情，那种异国青年之间陌生的吸引，我在想和爱情有关吗？

我到了巴黎，在火车站给摩尔打电话。原本准备先找一家小旅店，好好睡上一觉，恢复过来再和他联系，可是太累了，我没有力气走出火车站，于是在车站等待摩尔来接我。

他从远处的阳光里直接向我走来，相隔一年，我们还是对方印象中的样子。

我一夜未睡，又是接连几天的长途火车，害怕在他看来很难看，可他似乎并未介意。坐上他的摩托车，到他的家，十九区，高高低低的路，一面墙上画着巨大的一个男人，西装革履地蹲在地上。

附近电影院的巨幅海报上，尼古拉斯·凯奇正身穿军服在枪林弹雨中演绎着吴宇森的《风雨者》。

在巴黎的那一阶段，正是这部影片在此地热播的阶段，海报上的男人的脸，后来进入过我的梦境深处。我总是看到自己站在陌生的空旷的异国的街头，周围没有人，只有这张电影海报，海报上是我熟悉的尼古拉斯·凯奇的脸，他带着军帽，在热带丛林的背景下，依然如同那个濒临死亡的在拉斯维加斯游荡的酒鬼，他的脸一看再看实在熟悉了，我开始把他的忧郁当做性感。

摩尔的家到了，是在一栋位于高地的白色洋房顶楼，按号码门自动打开，有一个大的庭院。巴黎房子全是团团转的楼梯，四五层楼，盘旋爬到梯顶，人已全然失去方向，只知道弯曲向上。

他的那套房间，有着单身男人的干净，整洁，斯文。

洗完澡后，用毛巾擦干湿湿的头发，我开始感觉恢复。

在沙发上，我们有了第一次的法式长吻。他像我的西式宝贝，乖巧，好奇，不断地抚摸我，我们做爱，他和我以前见过的男人不同。这个生于1969年双子座的男人，让我在欧洲之行中终于有了性。

我还没有爱上他，可却允许他用性在我和巴黎之间画了一道连接线，让巴黎对我温情弥漫。

这个有着迈克尔·道格拉斯家族那种桃型下巴的男人，因为他的蓝眼睛透明无邪地看着我，因为他不会全部看懂我，因为他总是会对我怀着好奇，因为他想了解我却很徒然，因为他身上淡淡的香水味道，因为他白色的小小卫生间，因为他的卫生间里放着一台老式收音机——孤单的生活里需要有人在旁边叽里呱啦地代自己说话，因为他每天有和我一样听收音机的习惯，因为他有洁癖这让我感到放心，因为他整齐的衣柜和书柜，因为他无时不在的吻，吻平了我寂寞的心。

我相信他。带着相信，我在他的臂弯里甜甜地睡去。

醒来，正是黄昏，摩尔陪我去塞纳河边。

塞纳河边的旧书摊还是照片中的样子，十欧元一张的小照片，一百年以上的历史，泛黄。我嫌太贵不让摩尔买，骄傲又孤独的摊主不肯还价。

看着出现在各种图片中的塞纳河，我有点不敢相信自己真的到了它的身边。

著名真的有种神化的力量，一个地方著名，一个男人变得著名，都会有种光环笼罩住他们，你要花更多一点的时间才能了解到他们的本质。

这条举世闻名的河流，巴黎生命和艺术的源泉，它由东向西流经巴黎，把整个城市一分为二，河的南面被称为左岸，河的北面被称为右岸。巴黎市内总共有36座桥，横跨静静流淌的塞纳河，把左右两岸联结起来。塞纳河和巴黎密不可分，正如卢浮宫和巴黎也密不可分一样。

坐落在塞纳河畔的卢浮宫，一眼就让人看见华裔设计师贝聿铭设计的玻璃金字塔入口。那么经典的广场，有犹太青年在举行婚礼，有男孩儿在滑板和表演特技自行车，远远的还有几个身份不明的男人，竟然在一张桌上下棋，身上的衣服颜色鲜亮，看过去很像舞台剧的一个景。

第五节 美食美事

我在双倍桥上看巴黎圣母院，因为不知道英文里怎么说巴黎圣母院，我只好对摩尔说那是艾斯美拉达的地方。摩尔奇怪我的兴奋，他不知道艾斯美拉达对我来说意味着什么，卡西莫多又意味着什么。在看小人书的年代，我爱上了卫队长，那个英俊而又冷酷无比的男人，那个伤害了艾斯美拉达的男人。他让我初次懂得：爱意味着伤害，只有你爱的人才可能伤害到你。

我们在卢浮宫对岸的西提岛上散步。

静静地近观巴黎圣母院，这座融合了艺术宗教和权威的哥特式教堂，让人着迷的不仅是钟楼怪人的神秘传说和那已经深刻在我们脑海里的传奇电影。教堂底层并排三座桃型大门洞，左为圣母门，右为圣安娜门，中为最后的审判。门上布满了雕塑，描述圣经的故事，门卷上是长条壁龛，一字排着28座雕像。沿着巴黎圣母院的围墙，仿佛可以感受到她的体温，就这样慢慢地走，穿过即兴演奏乐曲的街头艺人。

天已经有点灰暗，使得放眼看去的巴黎有点破旧，像那些房子的颜色，都是陈年的痕迹。

逛他喜欢的小街，高高低低的城区，道路错落有致。

有些小街像上海，但比上海更有感觉。小街上有种忧郁的气息，并不平坦的石板路上飘落的树叶，牵着小狗的老妇，守着散发着焦味的面包炉的三明治店女服务员。

那家面包店很古老很小，我和摩尔一人选了一种手工烤制的三明治，味道很特别，面发得粗粗的，但是够劲。刚才看着那女孩儿麻利地烘烤面包，在面包中间开口裹上牛肉和沙拉，浇上油撒上葱。摩尔要的不是牛肉的，他咬一口自己的，非要再来咬一口我手里的，还把他手里的推到我嘴前。喜欢很多事都这样的和人分享，这个孩子气的法国男人开始让我烦恼。

街上那么安静，星期天很多店都关门。

老城区是不变的，也许起雾的时候看，一百年前也是这样，只有一栋很高的楼，好像在蒙巴那斯。

这样慢慢地散步让我高兴，巴黎让我高兴。它真的会让人滋生心底的浪漫感觉。现在我竟然感觉和一个法国青年谈恋爱的滋味也不错。在塞纳河边，他很自然地亲吻我，一点不用害怕别人看。我也看到很多青年情侣在这样美丽的地方突然浪漫而美丽地拥吻。

很多人都曾经喜欢过巴黎，即使有时想起来也会说巴黎一点也不怎么样，巴黎的很多街区很脏。

巴黎就像一个不老的情人，她的情人不止一个，当这一个变老了，巴黎还是年轻，永远有新的年轻的情人陪伴着她。幸福的女人应该和巴黎一样。

坐上摩尔的摩托车，去一家著名的传统巴黎老饭店吃牡蛎。鲜嫩，滑爽，带着柠檬汁的清香。可以看见系着白围裙的服务生以欧洲经典影片上服务生出现时的姿势，托着盘优雅而绅士地走来走去。

牡蛎被称为海底牛奶，在我国沿海城市也可找到，但法国人爱吃牡蛎是最出名的。

有人说，牡蛎的外形像女性的生殖器，而吃进嘴里的滋味则像男性的精液，所以它们是很多好色的法国人的偏爱。我不太同意这种说法，对我来说，牡蛎味道鲜美，如妖如魔，没有什么可比——尽管外形很怪，像扭曲的丑八怪贝类，要用一种特殊的刀来开启它们，门口有专门的人不停地在开牡蛎。新鲜的牡蛎不需要蒸，也不需要任何调味品，它们像三文鱼一样下面垫上冰，旁边有新鲜的柠檬就被请上餐桌。牡蛎天生带着一点咸味，加一点柠檬，用专门配的小勺把能吃的都从壳内分离，连汤带肉进入嘴巴，你只需体会它入口的清凉和鲜美，简直没法用语言说出。那种浅灰色的软体动物，吃它会上瘾，杨贵妃是想“日啖荔枝三百颗”，我如果是杨贵妃，每天有几个牡蛎吃也就知足了。

读过莫泊桑的《我的叔叔于勒》的读者，也许会记得如下一段描写：“两位打扮得很漂亮的太太吃牡蛎。她们的吃法很文雅，用一方小巧的手帕托着牡蛎，头稍向前伸，免得弄脏长袍，然后嘴巴微微一动，就把汁水吸进去，把壳扔到海里。”

当时读的时候我没想到，有一天我自己会在巴黎用同样的办法生食牡蛎，亲自品尝未曾遭受污染的牡蛎的鲜美。我对摩尔说起莫泊桑的小说，可他差点儿忘了，因为莫泊桑已经太古典了。

食物最讲究的是它的本味，最好是做法简单但又能吃出美味，从这一点看，我最喜欢两种美食，一个是牡蛎，另一个是中国的大闸蟹。阳澄湖的金毛蟹为其中的上品，金秋十月食之，桂花飘香，人慵酒酣。

在家里吃也方便，把几只二三两重的河蟹洗净后放入双层蒸锅，盖上盖后用大火蒸上15分钟即成。把姜切成丝，置入加了少许白糖的优质西湖陈醋中，食用即可。

我曾经特意赶往阳澄湖，在湖边的船上餐厅中大食蟹和白虾。渔民刚刚把它们从湖中捞上来立刻就成为老饕们口中的美食，那个鲜和嫩是不用说的了，说了现在还会流口水。

回江南老家的时候，有次被朋友接往一个叫隔湖的地方，一个画画的朋友就住在湖上的一艘小木船上。正是秋高气爽，照例还是我的最爱：虾、蟹还有特别肥美的鱼。其实这三样有一样已经可以吃得非常满足，三“鲜”加在一起反倒是有损口中味蕾，有些糟踏美味，但朋友之谊只会让他们把好东西统统端上来，船上的狗也知道来了客人摇头摆尾甚是高兴。我们在船上的正舱吃饭，脚底下有板可以活动，稍稍推开一角，底下便露出湖水，把吃完的虾壳蟹脚往那湖水里扔，马上有鱼游过来争先恐后地接，非常好玩。

在船上吃饭的好处，除了新鲜，就是景色好。湖色苍茫，吃饱了，大家就着湖水洗手洗脸，非常方便。然后马上可以开船，你不用

走出去，眼前便已换了一面又一面的风景，船上的人目眩神迷，忍不住会开始唱歌。

可惜，我想到这么多，摩尔却不能体会，在我们之间永远隔着理解的鸿沟，我不愿和他说很多，说了他也未必理解得了，他喜欢中国的饭菜，仅仅只是火锅的热闹和烤鸭的色泽罢了。

上好的白葡萄酒，鱼，我要了米饭，尽管米饭里拌了油和盐，我仍然高兴。

摩尔要了拌了洋葱和料的切碎的生牛肉，野人的口味。我们后来又干了红葡萄酒和水果浸泡在一起的西班牙酒。喝了满肚子水，我不时停下来上洗手间。洗手间在二楼，我带着醉意走在弯曲的楼梯，在墙上的镜子里看到一张绯红的快乐的脸，心里那个声音在批评我：你为什么感到快乐？可是我还是带着罪恶感地快乐着，快乐得带点罪恶感。

脸红红的，我有点头晕，整个老饭店有种罗曼蒂克的气氛，使我心不由主。我们又在塞纳河边走了一段。依旧飙车回去，风把我的长发吹乱了，凌乱得像我初到巴黎的心，我趴在摩尔的背上，感到现在只有他可依靠，想对他好，只能对他好，和他相守，暂时不想其他。

第一节 小凡的画室

早晨，他先起床，然后房间里满溢着咖啡的浓香。

他给我端来一杯，我在床上喝完，略微清醒，然后起床。

法国人的时间很怪，中午的时候他觉得是上午，晚上十一二点了，他还觉得是晚餐时间，还可以带我去朋友家参加晚宴。他们拖拖拉拉的，晚上八九点钟吃晚饭对他们来说时间还早，喝一杯酒正合适，可我早就饿了。

巴黎人告诉我，巴黎是到中午才活过来的。的确，漫步上午（不是凌晨）的巴黎街头，会觉得巴黎是一个既无灵气又无生气的城市。但是，随着中午的到来，巴黎开始焕发出一种很生动的面貌，街道行人真的都宛如活过来一样，由惺忪到振奋。直到夜晚，巴黎的气息才开始在灯光中绵软，透出丝丝缕缕的香艳来。

如果下雨——巴黎总是会下雨的——好像是哀怨的女人在流眼泪，想把身边的男人留住。下雨的时候，巴黎会弥漫一种失意之气，地铁里喝醉了酒的人更是如此。起雾的时候也是。在这个城市，你会遗忘了时间，可以把自己想象成上个世纪的鬼魂。

这个城市的人总是习惯于懒散，这些报社编辑、记者、失业人员、公司职员、模特、三流演员、艺术家、外来的旅行者、无所事事的人、失意的人、看上去天生就懂得优雅的人、闲散和忧郁的人，他们一天天地在街头咖啡馆里泡上很长时间，闲聊和发呆，直到彻底忘了一切。

喝麦片粥，用牛奶加麦片调和，新鲜的樱桃，草莓酱，黄油和面包。

上午我和他都属于半痴呆状态，不太说话，两个人都一边机械地吃，一边想着什么心事，很少说话。

刚洗过的头发湿湿地耷拉在脑袋上。

给南京画家汤国的朋友小凡打电话，他在郊区有个工作室，下午正好要做一个采访，我说可以一道去看看，于是摩尔送我过去。天有点雨，阴冷冷的，要去的地方很难找，是在郊外的旧工厂区。穿过空旷的皇宫和广场，摩尔不停地停下来问人，然后再上路继续前进。他真细心，有他我一点不用操心，怕我冷他还把自己的衣服脱下来披在我的身上。终于找到了，小凡在楼下接我们。摩尔在画室小坐，然后去报社上班。

我和小凡一见如故。他和汤国很像，他在法国十多年，但看上去还是有南京那个古城特有的古朴和旧旧的舒适感，说话慢条斯理，成熟稳重。他画的都是色彩鲜艳的花，各种各样的花朵，一朵就占了整个画面，抢眼，性感，有色情的隐喻，造型有雕塑感，那样性感的花如果做成琉璃，里面再有光透出来，效果肯定逼人。

小凡的花已经画了十年，在欧洲卖得不错，最近开始转向大的泡沫吹塑的虚实玩具加生活图景，我还是觉得那些花更惹眼。画的尺寸不大，但一幅又一幅，有量的堆积，布置在一面墙上，一张张看过去会浮想联翩，当然人不能老画一种形式的东西。

艺术家沿着一条摸索之路前行，总是对自己有不断的发现，有时又回到开始，但其中已经有了质的飞跃，不再是单纯地回到开始。

内容和深度，实力和炒作，这对画家来说也是必须面对的话题。炒作的最好状态是画家找到了和市场集合的最佳切入点。像艳俗艺术的代表人物杰夫·昆斯那样身体力行的艺术家加商人，他把自己和艳星女友的性爱场面做成雕塑，非常艳俗又非常好看，最后变得非常商业。他本人等于是一个演员加商人，有巨大的炒作能力，很牛气，也很有市场眼光，善于利用媒体，善于利用男女关系，善于利用艺术，会摆谱但又恰到好处。天才就是在适当的时机用最适当的方式来处理一切的人和事，所以，忌妒天才是没用的，他注定会拥有属于他的时期，他注定会成为那个时期里的代表英雄。

第二节 和艺术家闲聊

时势造英雄是不错的，那一个时期的人们需要什么，你又正好走对路，提供了一个那样的话题和市场，那就正好成功了。

20世纪90年代造就了世界超模，现在的模特再也无法超越。

用中文和一个中国艺术家聊天，这种久违的乐趣终于又回来了。

在上海，南京，北京，成都，云南，广州，我有过很多个在画家的画室里聊天的经历。在画室里的时间好像是停滞不前的，话题在闲散地游走，茶的清香，画上油料的味道，桌上闲散小书的味道。

我们互赠书和画册，我在我的书上题了：“感谢巴黎让我遇见小凡”，他在画册上题了：“初见如故，以百花为证礼”。他好久没看中文书，这下有我的小说可以消磨一下时光。

我们开车去附近一个咖啡馆喝咖啡，我吃了一个热狗，小凡接了报社的女记者，一起回到画室。他们在聊天，我在隔壁另外一个画家的工作室里躺在沙发上小睡。

法语像鸟语，把我的脑子弄得整天很晕。因为听不懂，所以更觉得他们说的都是啰唆的废话。

画家不在，只有墙上的画代替主人向我问好。

采访完毕，记者告辞。我陪小凡先去一家画框店，完事后，他开车带我看街景，慢慢经过协和广场，珠光宝气的梵登广场和里兹饭店，香榭丽舍大街，经过名店和浮华聚集之地，再经过凯旋门。

在车上和画家聊人生，世界真小，我们聊到以前我在上海时认识的一个女孩儿，女孩儿本来想利用艺术家在巴黎打天下，没想到艺术家更精，他把女孩儿锁在房间里，使她在巴黎结交一些人开始巴黎生活的梦想破灭，她来过巴黎却像从未来过。那个艺术家据说还有虐待人的情结，先后结过几次婚，每个女人都给他生了孩子。还算聪明的上海女孩儿最终逃走了，利用的计划落空，但人还算完好地打道回府。

我说其实现在国内的生活可以过得非常好，女孩儿没有必要像以前那样冲动地挣扎出国。

小凡说早晨那送你来的孩子看上去不错，很不放心的样子。反复关照一打电话给他他会过来接你，好像中国男人就是坏人似的。

我说是的，摩尔很好，比很多中国男人都好。以前我可能很想嫁给摩尔这样一个天上掉下来的法国单身男人，他会很绅士地对我好，甚至比国内很多男人单纯，有责任心，但是现在我却一点也不会这样想。因为更在乎交流的全面，更自我，不会委屈自己，贪图一点点异国情调。

小凡说，现在国内出来的女孩儿真的很厉害。那个上海女孩儿也曾想要来找他，幸亏他没收留她，留下来也不过会把他当做临时的跳板罢了。他现在的女友是一个希腊姑娘，还在读书，要比国内的女孩儿头脑简单很多。

我点头，国内女孩儿头脑复杂，那都是生活逼迫她们这样的。国内的男人同样比外国男人头脑复杂，可我不会喜欢头脑简单的摩尔，我还是喜欢中国男人，因为只有复杂的人才能理解复杂的人，看明白他们。有的人害怕自己被别人看明白，他们情愿躲在一个不太明白自己的异性面前过一辈子，可我不行，我需要身边的人聪明，不需要我和他解释初级的问题。

说了一下午的国语，我感到很舒服，小凡大概也很久没有人和他这样长聊国内的情况了。

下午五点半在卢浮宫附近的皇家公园、在过去皇帝的行宫里，等摩尔来接我，那里有很多黑白条纹的高高低低的小柱子，风格很现代，是一个法国著名的艺术家Buren的作品，据说在皇家花园里的这组设计争议很大，保守派认为它破坏了原来的园林整体风格。看来不管是法国还是中国，艺术总是无法避免保守派的攻击。

过几天摩尔会陪我去蓬皮杜艺术中心，那里正举办Buren的色彩与空间展览，我会好好看他的作品。

和小凡告别，摩尔带我去他的报社办公室。

充满纸张的环境让我感到熟悉，亲切。我感到摩尔有意识的介绍，他一脸以我为荣的样子，他的同事们好奇地注视着我。我们到顶楼的露台上小坐，风很大，可以远眺巴黎，老城静静的，上面压着灰蒙蒙的天。

第三节 所谓艺术家

摩尔一个星期回他父母家吃一次饭，他去他父母家之前，先带我去看了一下埃菲尔铁塔。铁塔真高真大。夜晚来临，铁塔上亮起了火树银花，在夜色中勾勒出铁塔的整个轮廓。

我坐地铁回19区，在家附近的温州饭店吃酱肉芋头汤，木耳鸡块，还有温州馄饨。女人适应环境的能力真是天生的。现在我已经很会坐巴黎的地铁，可第一次独自一人坐地铁的时候，拿着巴黎的地铁路线图，坐是坐对了，但到站了就是找不到出口，来来回回绕来绕去的，一直在地铁里打转，跟一只耗子似的。有一个唱摇滚的哥们儿在日本发生过和我那天情况一样的事情，但他是在坐地铁前被人塞了一颗迷幻药物在嘴巴里，坐着坐着地铁，药性突然发作，他满头大汗，在地铁的迷宫里穿梭来去，就是找不到门去寻找自己要找的方向。当时我取笑过他，没想到在巴黎我没吃药就已经跟一只耗子一样了。

那样的经历以后就没有了，我很方便地顺着箭头的指向找到出口。

吃完饭，散步，途经剧院，市场，商店角落里的墙上贴满写满中文的招工和租房讯息，19区混杂居住着很多中国人、印度人和阿拉伯人。黑人开的香料店，各种特色店比比皆是，他们时常在街头跳舞，有上来搭话的男人，我一概说听不懂。买到了中国豆腐，小块的，犹如满足了我所有的乡情。

在卖水果的小摊上买了几个梨，可回家后才发现极难吃，粉粉的乳膏状，没有香味也没有味道。摩尔回家后，把它去了皮加调料，撒上油，就变得像起司一样好吃。可我还是不吃。

他用字典查出来告诉我，那是一种叫鳄梨的玩意儿。

给上海女孩西西打电话，我认识她父亲，她父亲说他22岁的女儿在法国一年半就把很多女人十年里的路都走过了。她和一个法国青年

结了婚，她先是在开酒吧的老公手下打工，过了语言关，结婚后她很快生了孩子，一个大胖儿子，西西带孩子带得很辛苦，因为法国人不会请保姆照料，但孩子大了就好了，西西说她已报了大学的班，会一边带孩子一边读书，这样孩子大了，她也可以再找一份喜欢的工作。

向西西要了电影学院导演系毕业后在巴黎开旅行社的燕青的电话，然后和他约下午三点半在海明威以前住过的街区蒙巴纳斯见面。那栋高楼是在蒙巴纳斯。

我看过一本书，名叫《巴黎的放荡》，又名《一代风流才子的盛会》，说的是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的巴黎，包容了毕加索、海明威、阿波里奈、阿拉贡、莫迪利阿尼、马蒂斯、雅里、马克思、雅各布、帕森、马雅可夫斯基和季亚吉列夫等一大批世界著名的艺术家、作家、诗人、画家早期生活的各个侧面。他们的大胆想象和创新带来了野兽主义、立体主义、达达主义、超现实主义和无政府主义。

艺术家不是圣人，他们的创新来自各自推崇的自由：创作自由，思想自由与生活自由。于是伴随他们吟诗作画的艺术创作生涯，就出现了一些放荡不羁如同痞子似的生活方式：佩戴用纸或树皮制作的领带；将短裤套在上身当衬衣，穿着满大街游荡；用金表换一些破烂拖鞋；经常喝得酩酊大醉，在蒙特马特和蒙巴纳斯大街上随意鸣枪开道；在餐馆酒吧中打架斗殴，寻衅滋事；身边女人成群，更换不迭……

第四节 乱世出英雄

艺术家的人品和性格也形形色色，各式各样。

有的生活清贫，省吃俭用，却全力资助他人。

有的收入颇丰，过着奢华生活，却背叛恩人，见死不救。

有的喜欢热闹，整天前呼后拥，从酒吧到舞厅，从舞场到郊外，甚至临时决定开车到海滨，毫无计划地欢度终日。

有的喜欢独处，同他人老死不相往来。

有的对爱情忠贞不渝。

有的见异思迁，喜新厌旧。

他们之间也常发生勾心斗角，争权夺利，忌妒仇恨和无可奈何的事情……

我欣赏艺术家，但在生活上我害怕艺术家，他们具有摧毁的力量。

可笑的是，艺术有时成为附庸风雅的手段。典型的例子是一个年轻人，参加了一个自称为“饮水人”的小组，因为他们十几个成员除了水之外买不起别的饮料。他们都无甚才华而雄心极大，住在茅棚或牛圈的阁楼上，在饥饿的鞭策下做着艺术，把仅有的几个法郎用在花费不大的放纵上。有一年冬天，他们第一次有了火炉：这是在楼板上挖的一个洞，牛圈里牲畜的体温从洞里上升到他们的房间。他们患有穷艺术家的职业病——肺结核、梅毒、肺炎，所有这些疾病由于营养不良而加剧。有才华的年轻雕塑家死了，可能他是这伙人中唯一的天才，这样的葬礼接二连三，他们把口袋里所有的钱全掏出来才凑够买一个木头十字架放在坟上。

这样的生活实在过不下去，年轻人开始写他和朋友们的生活，这是他所知的唯一的生活。就他本人而论，他痛恨并想尽快摆脱这种濒于冻饿死的生活，但是他设法写得使广大读者觉得这种生活有情趣。这样的一本《穷文艺家的生活情景》取得的成功超出了他的奢望。这

本书使它的作者一下子过上了资产阶级的舒适生活，而且他改变了群众心目中的一个形象。穷艺术家和一种有情趣的生活方式挂上了钩，这一点有点儿像国内当初的圆明园画家村。穷变成了一种招摇的手段，曾经被人瞧不起的穷文艺家聚居区，为了维持生活而不得已采取的权宜之计变成了一种永久的生活方式，变成了一种以仪式和服饰为标志的流派，变成了一种教义、有人以模仿他们为时髦。信奉这种教义的不仅有年龄不同、贫富有别的文艺家，而且在后来的岁月里还有美术设计师、行业报纸的记者编辑、室内装潢师、色狼、同性恋、资助艺术的百万富翁、性虐待患者、女色情狂、桥牌能手、无政府主义者、靠赡养费生活的男女、疲惫的改革者、教育狂想家、经济学家、吸毒者、患酗酒病的剧作家、裸体运动者、餐馆老板、证券经纪人和渴望表现自己的牙科医生等等。

之前我看了一篇论文：艺术家的心理学。

研究证实，艺术家多半有严重的虚弱、依赖、孩子气、天真、被虐待狂、自恋狂、不懂得区分善恶，以及恋母情结等倾向。艺术家的童年往往比别人敏感，他们也比一般人更渴求母亲的爱。等到成长以后，艺术家便可以到处寻找母亲的形象，如果无处觅寻的话，他们便在自己的作品中，塑造出一个理想的母亲。

艺术带来的名气，并不能真正弥补早年缺乏的爱。即使世界上的人都爱你，也填补不了某个特定人物的空缺，同时，这个世界也绝不可能像母亲那样的爱你。因此，名声也带来了失望，于是，艺术家转向鸦片、酒精、同性恋、异性恋、双性恋、宗教、政治、自杀等寻求慰藉。

但这些办法，也不能完全解决问题，除了自杀以外。

安东尼·波奇尔曾说过一句话：“……充满了痛苦，唯有死，才能治愈灵魂的痛苦。”

这句话正好可以用在艺术家身上。

乱世出英雄，乱世也出艺术家，现在的艺术家，即使出来也会循规蹈矩得多了，他们已经懂得向生活妥协。

第五节 帅哥燕青做导游

燕青是导演系毕业的，应该也是艺术家。可他在巴黎开的是旅行社，娶的法国太太，即将给他生孩子。开旅行社的好处是他还是可以艺术地在各个国家走，以工作的名义看各个国家的美女。

我拍下了蒙巴纳斯地铁站，楼前的时间停在了三点半的刻度。空无一人的旋转木马一圈圈地转过去，忽高忽低。

一个光头帅哥停在我面前，我们从未见过面，但很容易相认。

坐上他的车，去洛东达咖啡馆，那个一百年前艺术家们爱去的地方。

在露天座上喝咖啡和热巧克力，闲聊东方的神秘，还有我们喜欢的台湾导演骨子里的黑暗、绝望和暴力，从侯孝贤、杨德昌到蔡明亮，他们生活在现代，内心很传统，很反叛，很深刻，时常反省，不像大陆的大多数导演那么麻木、逃避和及时行乐。在巴黎聊到蔡明亮的《你那边几点》，一部讲述中国台湾和法国巴黎，两边一对年轻人故事的影片，感觉是恰到好处的。蔡明亮有怀旧情结，我怀疑他和我一样是巨蟹座的。他喜欢法国新浪潮电影，因为一部《四百下》而迷恋特吕弗。为了这个特吕弗情结，后来他特地拍了一部片子向这位法国电影大师致敬，片名叫《你那边几点》，也叫《七到四百下》，2001年的作品。他拍过不少作品，我几乎有他所有的影片，除了1992年的处女作《青少年哪吒》。不管是《洞》《河流》《爱情万岁》，还是《你那边几点》，所有的片子里都有一种阴郁的气氛，都有一个同样阴郁不健康的男孩儿李康生的脸，他喜欢起用女星杨贵媚，我很喜欢这个女星的名字，很唐朝。

和燕青有一搭没一搭地说话。他问起我的计划，看是不是要像以往接待国内来人那样安排一次西班牙什么的旅行路线，我说可能不需要了，我的时间只来得及去波尔多，那是摩尔早就定好的，过两天就出发。因为找我需要打摩尔的电话，实在不方便，燕青提出陪我去买

一个巴黎当地的卡，换在我的手机即可用，这样我在巴黎就有一个自己的号码了，人家打给我还不用钱。那种卡和神州行一样，可以用两三个月，在我的旅行期间是足够的了。

于是就去买卡，回家后才发现我的三星手机型号不符，巴黎号码还是没用成。

这是后话了。

当时天开始下雨，黄昏时分的蒙巴纳斯，燕青说附近有一个著名的公墓，杜拉斯和萨特以及波伏娃现在都常驻在那里。我当然觉得向导提出的这个节目很对我胃口，只是燕青的手机响了，他要赶回旅行社，只能把我一人撂在公墓了。

燕青安慰我那里很安全的，我说当然，当然，我知道很安全。

我瞧着自己穿着黑衣服，头上裹着大披巾，心里说这些大师不要见了我的样子怕才好。公墓真大，我在门口下车，燕青和守门员问了几句，守门员正在打铃，一种古老的铃，铃声响彻整个墓园。他说里面已经没活人了，我要是想进去看得快点出来。燕青问杜拉斯在哪儿，守门员朝一个方向虚晃一下手。

我答应了，沿着主路向墓园一路走进去，也来不及细看那些墓碑上的名字和照片，老实说，一个人走在下雨的墓园里我还是很害怕的，特别是天阴阴的黑夜即将降临，尽管国外的墓园漂亮干净得像花园，每一个墓碑都不一样，点缀着鲜花，十字架肃立，年轻的欧洲女郎定格在墓碑上——我不敢惊扰那些睡着的人的长梦，怕他们突然从墓里出来看着我新鲜把我拖进去陪葬。

离他们略微有点距离地走，走过一条条支路，雨还在下，我用头巾把自己藏得更严实了，看上去我自己都觉得我像一个幽灵。

就这样走在墓碑之间，突然身后有脚步声响起来，一个身穿连帽雨衣的男人正在向我走来，嘴里咿咿啦啦，手还大幅度挥来挥去，我以为真的出现鬼了，可“鬼”手里的小铃铛摇了起来，原来是守门员看我久久不出来，进来催我走了。

我还是没有弄明白杜拉斯和萨特的家在哪个位置，就此别过。

第一节 活人墓园和江南的恐怖

我看过很多关于墓园的图片，毫无例外，和我眼前看到的一样，都非常美，非常艺术。

有一位做地产的朋友冯仑，他有一阶段对死亡的话题和书籍产生了疯狂的热情。

到处看墓园，在莫斯科看完后，开始想在国内做一个名人的活人墓园。也就是说，请各行各业活着的名人自己为自己设计墓碑，设计墓地，这样每个人会给那方园地带来属于自己的不同风格，也许每一种不同集聚在一起，就使这个活人的墓园有了无可辩驳的特色，在他们生前就开始收门票供人参观。

商人的逻辑是把任何资源都化作商品来开发，活人、名人、墓地、艺术、商业、炒作——种种奇怪的因素结合在一起，将产出一个怎样的怪胎？

也许可供冯小刚再导一出贺岁剧。

墓园要招商，要有专门的管理层，营销网络，公关宣传部门，形象代言人，以园养园，以园生园，每一位要求加入活人墓园的人都要进行资格审定，墓主简介和设计思想都可以在配套的图书中尽情展示，要签百年以后入归此地的合同，不使墓园名不副实，要开发相关配套服务，和开发周围的旅游资源，使人不管活着和死去时都能享受美景和快乐。

在活着的时候就想到死，死对活人是个永远的诱惑，因为我们不知道死去之后的世界会是怎样。

美国有一位女明星就有自己的墓地，她还活着，她会戴着墨镜，偷偷地来看在她墓前凭吊的人，看他们的表现，看他们送来的鲜花，如果来看的人少了，活着的她的脸上会显得很落寞。

如何把死亡塑造成一种艺术，如何因为我们对死亡的关照和尊重使它不再显得沉重和灰暗？

如何克服自己在死亡话题上流露出来的重重忌讳？

死，当然隐含禁忌，因为我们不知道哪里暗含机关。

有时候，我们谈论死亡，只因为我们害怕，希望避开，我们甚至在年老和病重时故意用丧事的做法来冲喜，来以毒攻毒，使生命重获生机。

我们要的是生，一点点小小的不吉预兆都会使一个想入非非的计划变成一盘散沙，难以再执行和推广。

生命开不得玩笑，是因为死后难以复生，或者复生也难以让活人看见和信服。活人墓园，当然是炒作的好题材，但要以生命当靶子可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

说到墓园的恐怖，那还不如我的老家江南的某些小镇和小岛留给我的印象恐怖。

有一些聊斋和狐仙的片子经常会找那样的恐怖地方拍。去那样的地方，最好是下着雨，江南特有的阴湿绵密的雨，可以一连下一两个月，下得所有的东西都开始发毛，空气中有一种无形的东西压得你透不过气来。

这时候你撑着一把油纸伞走上那条青石板路，人走在那样的路上连一点声音都不会发出来。又湿又滑的路，弯弯曲曲，两边是白的墙和灰的瓦。

总是遇到小路边的老桥，老桥倚着河，河边有一座茶楼，门口挂两盏破红灯笼，风吹过来，雨打过去，破红灯笼晃荡着，发出虚弱的光。

街上总是没人，晚上十点已经寂然无声。

小镇和小岛上这几年的最大特色是有了很多空出来的老房子，孤零零的院子，孤零零的老宅。主人都到前面的空地上另外盖了新楼、新的小洋房住着了。或者，主人们移居海外，或是在外地谋发展，把老家的房子都空了出来，任它们闲置。

这样的房子，以前算是大户人家才住得上的，可不管当初有多热闹，曾经怎样子孙满堂，现在都一概荒落，前面的院子里杂草丛生，后院的柴房墙上还留着毛主席的大红语录。

房子一般是木结构的，楼梯踩上去照例是吱吱呀呀，如果你有胆上楼，上楼了又按捺不住好奇心偷偷地朝楼上紧锁的几个木门的钥匙孔里往里张望——你会看到什么？

大多数人看后马上脸色发白，或者铁青，在惨白或者青黑的天色映照下，室内空空荡荡，该搬的都搬走了，墙上却恍恍惚惚还挂着一张大小合适的黑白全家福。再仔细看，屋子的另一个角落赫然停着一具寿材，黑黝黝的，庞然占据着你的视线，让人不得不被那气势所震慑，被这种出其不意的恐惧所击倒。

在农村，家里为老人准备一口棺材并不是一件特别的事情，老人生前生病了用它冲喜，或者看着也心安。只不过时代在变，很多准备好了的寿材最后老人并不一定能睡得上了，有的，便只能空空地停在被废弃的祖屋里，伴随着一日深似一日的空寂。

夜晚推开木门发出的声音，人走在木楼梯上踏出的声音，风掠过破旧的木窗户发出的声音，猫站在深秋的墙头突然发出的惨叫声，还有隐隐约约的人声，你明明听到了声音，定睛去看却看不到一丝人影——这样的恐怖胜过巴黎的墓园千千万万倍。

第二节 他和她，还有起司先生

她享用他的咖啡、酸奶、樱桃和面包，但他不碰她的中国豆腐、鱼香榨菜、生煎包子和木耳鸡，使她感觉像榨菜一样受冷落和忽视。

她跟屁虫似的跟着他，时不时拐进一家路边的小咖啡店喝上一杯。

时不时和街角一家小餐馆的老服务生打招呼，坐下来吃他推荐的肉和鱼。她看不懂墙上写着菜单的黑板，他就是她的眼睛和耳朵。当然，永远有好酒，好的香槟，纯净的白葡萄酒。

她在熟悉他的生活方式，好像她自己毫无生活经验可言。

他不断把她带到以前的市政厅和皇宫中看现在的展览。

她听他的音乐，在一些熟悉的唱片封套中寻回往日情怀：

BEATLES在唱Here, there and everywhere——古典音乐与buddha bar, AIR的《moon safari》：a night at the playboy montion。

她喜欢猫，把它们叫做欧洲的小虎。哪里的小虎都有着相近的脸和表情。

他带她去蓬皮杜看现代艺术，看毕加索的立体派时期，看黑白小电影里1924年的巴黎，人像木偶似的走动，双轮车，骆驼，迎娶新人的队伍，奔跑的人们西服革履。Buren的色彩与空间展览让她眼界大开，他太善于利用色彩和空间的变幻制造效果了。空的空间，镜子，色彩和条纹，不规整的房间，门和门，门和墙的交会，灯光打出的圆，灯光制造的隔离感觉，投影器和电视画面——一切既现代又完美。

中国艺术家蔡国强作品中的火爆破场面在不停地滚动播映。

坐在展厅旁边用透明玻璃和银色材料做成的漂亮餐厅里，看每张桌上放置的玫瑰花瓶，那几乎也是一个装饰作品，不是可以随便消费的所在。他带她去他的作家朋友的家中作客，吃传统晚餐。

矮矮胖胖戴一副黑边小圆眼镜的作家在十年前来过中国的西安，他还在西安买了一尊秦俑运回家。他那在出版社工作的太太一身黑衣，面露疲惫的忧伤，一问才知道，她的老板今天早晨突然心脏病发作离开人间，事先一点预兆也没有。

作家在小小的桌子上切火腿和香肠，桌上台灯颤抖，她和作家太太相视而笑。切下的火腿可以直接放在嘴里，配面包吃。作家下厨做了两道热菜，并且拿出四五种起司供她挑选，有荷兰起司、意大利起司、法国起司、德国起司。她只知道那些东西颜色不一样，浓度不一样，味觉不一样，她并没有太多兴趣一一品尝，可作家热情备至，需要她一一品尝法国美食的不同之处，于是她给作家起了一个外号“起司先生”。

起司先生正在给法国的美食写一本书，书里包含有大量的法国名店和名厨师，图文并茂，为此他有很多时间是在采访和品尝中度过的，称他为美食家也不为过。

美食家的身上一般总洋溢着陶醉的乐观态度。因此，起司先生家里窄小的房间、窄小的厨房和卫生间都算不上什么了，一个中年法国作家比她这样一个青年中国作家家里要小很多。他和她聊起出版制度，出书的问题，很多问题是相似的，年轻作家的书和题材可能更会受市场欢迎，也更容易炒做成市场畅销书。起司先生以前的小说是宗教题材，关于一座教堂什么的，写得很厚，但她即使看得懂可能也无心细看，从中反映出她的漫不经心和起司先生对待问题的严肃态度。他烟瘾很大，时不时在烟丝袋里摸一把，卷着烟纸很快就卷出一根烟来，放在鼻子下面闻上一闻，再放进嘴里，轻松地吸上一口。

她和作家太太提到杜拉斯，她忧伤的眼睛里突然有光闪过。她是不是想起了曾经打动过她的那个女人小说里的情欲？当她想到她，眼前简陋的房间、朴实的丈夫也许突然被那一种情欲之光笼罩，只有情欲，可以使人忘记眼前刚有熟人死去的现实。

男人抽着烟，刚刚结束晚餐，品过了几瓶上好的葡萄酒，眼睛在镜片后面思考着什么，这个样子很作家。

第三节 巴黎的慵懒

在阳光灿烂的巴黎的街上，享受巴黎的慵懒。

在街头的无名咖啡馆，看海明威和自己的书。

在一个下雨天，我想象海明威在雨中走着，经过亨利四世中学，古老的圣提安杜蒙教堂，以及冷风呼啸而过的万神庙广场。为了躲雨，他紧挨着右边走，最后沿圣米榭大道背风的那侧走出了广场，继续往下走去，经过克吕尼博物馆和圣杰曼大道，终于来到圣米榭广场上他常去的一家雅静的咖啡馆。

那是一家气氛宜人的咖啡馆，温馨干净，充满了人情味。他把旧雨衣挂在衣帽架上晾干，把破旧的毡帽搁在长凳上方的架上，而后叫了一杯咖啡加牛奶。服务生端来后，他从大衣口袋里取出一本笔记本和一支铅笔，开始写作。他写的是一个关于密西根的短篇，那天朔风肆虐，冷飕飕的，因而小说也发生在同样寒风凛冽的日子。他在童年时、少年时和刚成年时都看见秋日将尽的景象，而且，有时候在某地写作会比在另一个地方写作更好，这或许就是所谓的把自己移植到何处，他想。人和其他生物也都需要同样的移植。然而，小说里的小伙子们正在喝酒，他不禁也觉得口渴了，于是叫了一杯圣詹姆斯牌兰姆酒。在这样冷的日子里，喝这酒最对味。

他继续写下去，感觉不错。上好的马汀尼兰姆酒温暖了他的全身，也振奋了他的精神。

一个女孩儿走进咖啡馆，独个儿在临窗的桌子旁坐下。她长得很美，脸蛋清新有如新铸的钱币——假如可以用柔滑的肌肉和雨水浇过的皮肤来铸钱币的话。她的头发黝黑得好似鸟的翅膀，剪成一刀齐，斜遮住她的脸庞。

他凝视着她，她牵绕了他的思绪，使他兴奋异常。他很想把她写进他的小说，或者别的什么作品里，但她坐在能看得见街道和咖啡馆入口的地方，所以他知道，她是在等人。

他于是继续写作。

故事仿佛自动铺展开来，他的笔好不容易才跟得上。他又叫了一杯圣詹姆斯牌兰姆酒。

每当他抬起头来或者用削笔刀削铅笔时，他都会瞧那女孩儿一眼，任由刨下来的卷曲状笔屑掉进酒杯底下的碟子里。

“我看见你了，美人儿，现在你是属于我的，不管你在等谁，也不管我以后能否再见到你。”他心里想，“你属于我，整个巴黎也属于我，而我属于这本笔记本和这支铅笔。”

而后他又开始动笔了，全神贯注在小说里，忘记了周围的一切。现在故事不是自动铺展开来，而是由他驾驭了。他没有抬头，也没有留意时间。他不知自己身在何处，也不再叫圣詹姆斯兰姆酒了。不知为什么，他厌倦了那种酒。小说终于写完了，而他，也累了。写完最后一段，他抬起头来找那个女孩儿，可她已经离去。但愿她跟一个好男人走了。虽然这样想，他还是觉得有点怅然。

他把小说合进笔记本里，放进大衣的内口袋，而后叫来服务生，点了一打葡萄牙生蚝和半瓶无甜味的白酒。每次写完一篇小说，他总有股被掏空了的感觉，既愉悦又忧伤，仿佛刚刚做完爱一样。他相信刚刚写的是一篇很好的小说，但究竟好到什么程度，他要到第二天重读才知道。

当他吃下带浓烈海腥味的生蚝时，冰凉的白酒冲淡了生蚝那微微的金属味道，只剩下海鲜味和多汁的嫩肉。他吸着生蚝壳里冷冷的汁液，再借畅快的酒劲冲下胃里，那股被掏空的感觉消失了，他又愉快起来，开始作下一步的计划。

当我下笔却找不到感觉时，我也会像他回想起史坦茵小姐的指示那样想到：别着急，以前你能写，现在也同样能写下去，目前能做的，就是写下一句真实的句子，把你所知道的最真实的句子写下来。

现在我像他一样，坐在巴黎的一间咖啡馆，不同的是，我的眼前没有美人儿，我的面前也没有笔记本和铅笔，我不想写作，我只是在

消磨巴黎的时间，像无数巴黎人一样把下午的时间闲散地度过去。窗外的光已在不知不觉中由亮转淡。我走出咖啡馆，和海明威遇到的又冷又雨的天气不同，现在秋高气爽，我沿着小街逛那些一家一家连在一起的小店，买了几样中意的衣服，裙子和拖鞋，一看还是印度出的。

然后在一家清静的中式小店坐下，女服务生是个亚洲女孩儿，说一口流利的法语，偶尔在电话里说潮州话。店内供应法国口味的中餐，陈列在橱窗内现点现卖：红烧排骨，虾仁豆腐，白米饭，是我想吃的饭菜，但入口后才发觉已经不是我想象中的味道。我总是在寻找一种记忆中的味道，可惜什么都会改变，更容易改变的是记忆中爱的味道。

将就一下吧，看来胃的蛋白酶决定了一个人改变不了的乡愁。

第四节 卢浮宫，罗丹博物馆，薇薇安穿堂

摩尔说你一定要去卢浮宫，你怎么可以不想去那看看呢。

我说太多的藏品会让我累，我情愿看画册上的卢浮宫。

他还是把我带到了玻璃金字塔。

幸好他没容许我懒惰。我面对艺术品叹为观止，再小的雕塑都带着灵魂，四五百年前的油画都仍然栩栩如生。

头晕目眩，那些房间就是一件件值得珍藏的艺术品，艺术的艺术，让人压抑和失语，如果老是看这些珍品，艺术家还有何为？在蜜罐边泡的蜜蜂只有一头栽进去被自己人酿的蜜呛死了活该。

我竟然没有看见著名的蒙娜丽莎，走出那么大的地方，我才发现我错过了她。黄永玉在卢浮宫亲眼看见夫妇俩指着伦勃朗画的一副老头儿像赞叹地说：“啊！蒙娜丽莎！”

真正的蒙娜丽莎却是既被双层的玻璃罩子罩住，又给围得水泄不通。

在享受完令双脚疲乏的文化大餐，在我喜欢的小王子专卖店里买了几样礼物后，去对面街头酒吧的露天座上享用三文鱼套餐和橙汁的美味，松懈神经。

英俊的服务生不给我菜单，他喜欢逗我说话，他看着我说：“我就是菜单。”

铺着橄榄叶的米饭真香。

下午摩尔陪我去罗丹博物馆。

说博物馆其实是一个点缀着罗丹作品的公园，一个与自然结合在一起青铜大理石等材质的大师作品展。

巴黎人真有福气，他们随时随地可以休息，就在美轮美奂的景色和大师的艺术作品旁边。喷水池边备有躺椅，走累了就躺下来看一本书发一会儿呆，旁边罗丹的沉思者背衬着蓝天正在永久地沉思。地狱

之门在显微镜的设置下每一个细节都近在眼前。我和摩尔仿造雕塑的姿势拍照。

再从国家图书馆、银行和股市及法兰西喜剧院四大建筑之间，找到胜利广场，骑着马的贞德雕塑已成为巴黎新时髦的象征。胜利广场的氛围是富裕中带着风雅的，体现着巴黎的日常风貌，非常生活化，它不像香榭丽舍大街那样过分张扬。这里窄窄的街道刚好过得了两辆车。两旁建筑没有深宅大院，却雕花精致；商店没有闪烁的霓虹灯，却都精心布置着橱窗，贩卖高尚的货色；而走在有着大起大落历史的穿堂里，才更感觉到岁月沧桑带来的魅力。

19世纪初期，有顶的弄堂雨后春笋般在巴黎冒出，其中薇薇安穿堂建于1823年，它的建材用的是当时最时髦的钢铁和玻璃，流线造型顶上透着天光。一间间体面的商店酒吧一间连着一间，绅士和淑女不怕弄脏及地的裙摆或昂贵的皮鞋，商店里冬天体贴地放着暖气，雪大的时候会特别温馨。

摩尔说那个年代的薇薇安穿堂是花都最时髦最热闹的地方，熙来攘往的都是精心打扮的人们。不过物转星移，时髦的穿堂没风光多久就被冷落，工业兴盛经济起飞，小巧的穿堂顿时显得不够大不够宽不够气派，不再被逛大街的人们放在眼里。体面的商店转让给了作坊，有的甚至任由倾颓，原本典雅的设计居然成了贫民窟，甚至堕落成为藏污纳垢的角落。

沉寂一个世纪以后（人能耐得住这么长时间的寂寞吗？），直到20世纪末期，薇薇安穿堂又被复古的风潮唤醒，从以往的角落被挖出土，整修复原，费了好多功夫，又变成今日的时髦。怀旧的气息结合流行的指针，非常酷的前卫。

其实可以不管这些兴衰历史，胜利广场和薇薇安穿堂今日就像当年一样典雅，中间的起落像是一笔勾销。我反正也没看见过它们的衰败，但是也许可以从一扇雕花门、一个古老的门面上发现典雅之后的沧桑，巴黎的美，本是岁月沧桑的结晶。

薇薇安穿堂内有浓浓法式沙龙风的花店，水晶瓷器店，晚宴礼服礼帽店，金碧辉煌的法式古董家具店，还有一家专门出售巴黎历史的老书店，硬是把巴黎塞纳河畔的旧书摊比得观光味十足，店中仍坚持用木头梯子找书的习惯。就是这么优雅到骨子里的环境，硬是被一个设计大师颠覆掉了，他让巨大的生铁及锈铜大方地坐落在马赛克拼花玻璃中，说不出的怪，但俨然更成全薇薇安穿堂的魅力，优雅中见现代，巴黎的优雅不正是可以和作怪友好相处的吗？

在巴黎，人容易情不自禁，处处都是可看的历史和风景，人自然也会变风雅和情趣起来。人在风景中本身会成为风景的一部分，但是也会破坏风景的一部分，比如塞纳河桥下的桥洞内处处有人和狗的尿迹，臭不可闻，实在破坏美景——这里很难找到厕所，为什么不考虑到逛塞纳河的人们方便的需要呢？桥上的情人们在拥抱和法式热吻，桥下则这样一幅不对称的景象。

在整个欧洲，美景都是天然和敞开的，为人服务的，一个穷汉和一个富人可以一样地在美景中阅读，悠闲地在公园的长椅上度过整个下午。当然，富人肚子里可能塞满珍馐美味，穷人则空空如也。

第五节 女人的性梦

又去摩尔以前的报社同事家作客，他总是带着葡萄酒上朋友家的门。

这次是花园露台上的晚餐，上好的西班牙北部的火腿，意大利起司拌的西红柿沙拉，鱼，牛肉，哈密瓜，面包和通心粉。摩尔的旧同事是一位风韵犹存的中年女人，原来也在报社，后来调到一家新的杂志社工作。杂志我看了，很新潮，主要是做流行文化，介绍各种文化新人，新的书和新的唱片。看来编报纸做杂志的要比作家有钱多了，她家里就比起司先生的家要宽敞很多，还可以在露台上很有情调地吃晚餐，旁边是自己的小花园，花草的下面装有自动灌溉系统，主人外出也不用担心了。

她家里有两个男孩儿，一个12岁，另一个14岁，14岁的少年很奇怪地在学校里报了学中文的班，他很喜欢学中文，因为据说很难学。他们要我给他起了一个中文名字，因为他们知道摩尔的中文名字就是我给起的。我说你就叫云吧，他的法国小名听起来很像中文里的云，而且，他是个小帅哥，清秀帅气的法国少年，有点像年轻时的阿兰·德龙，我想他要是来中国会迷倒很多中国的女孩子。弟弟邀请我和他玩一种皮球游戏，皮球在他的身上滚来滚去就是不掉在地上，可我哪有那么好的技术，三下两下就不行了。

两个孩子吃不了几口菜就退回到电视旁吃着冰激凌看着电视。

我被不断介绍给他们新来作客的同事，男主人也回来了，戴着眼镜，看上去很文化。法国人一坐到一起就聊起来，有声有色的，七情上脸，和北京那帮哥们儿看上去有的一拼。

我和摩尔提早告退，换另一个收门票的俱乐部Cabaret去玩。这里汇集了很多新潮男女，可能抽了什么东西或是酒喝多了，晕晕的，High得很，一边挤在一起热舞，一边热望和等待，在人群中搜寻目标。熟悉的电子音乐响起来了，我好像回到了北京的88号，刚兑好的

螺丝刀酒一杯一杯让我心醉，我们的座位旁边是一个大包间，连着的日本榻榻米似的床位，上面的白色丝绒垂下来看上去风起云涌。

在一个各种各样人种汇集的地方，每个人看上去都很怪，反倒什么都可以看作平常地去接受，再美再怪的也都变成了平常，这是一种淹没，你可以不用太在意自己的一切。

摩尔的两女一男朋友来了，我又叫来了燕青。天蝎座的他容易给人对手的感觉，一看见他，摩尔就把我的手故意拉得紧紧的，好像一副他是护花使者的模样。

其实双子座的摩尔眼睛里一向对我的朋友有警惕和防备的距离，他防备我和别的异性见面，如果要见别人，他会问：“难道你和我在一起不快乐吗？”

我说：“我和你在一起很快乐。每天早晨你煮好咖啡端给我喝了才让我起床，到哪里去都陪着，或者都交代好路线了还给我画地图，我很感激。可是我需要说中文，现在我已经堕落到看到英文报纸都感到亲切的程度了，你们的法语让我头晕，我只是要见一些中国人和他们说说我自己的语言。”

燕青也觉察出来了，悄悄对我说：“这哥儿们什么意思呀。”我一听他的北京话就乐，我说他能有什么意思呢。

燕青的老婆是法国人，怀孕三个月了，他对老婆还是挺好的，有时间就会在家陪着。这个星座的男人还算爱家爱小孩儿，即使花也是偷偷的，不会伤老婆的心。他们本来就可以做私家侦探，喜欢做事神秘不留隐患，所以家里的老婆很难发现他们的错处，做到这一点对男人来说已经不容易了，谁让天蝎座的男人天生对美丽敏感，容易想入非非呢，这帮好色的鬼。

我现在很喜欢了解天蝎座的男人，这个星座的男人看见我也会有种奇怪的蠢蠢欲动。

燕青和他们大聊起法语，只有我听不懂。

他一会儿又和我说点中文，摩尔他们也和我说点英文，整个台上一副国际化交际的场面。

我起身去厕所，卫生间在挂满白色丝绒的塌榻米那边，我正摸索过去，背后有个人抱住我的腰，我正要叫，突然听到了中文，燕青在说话，他说你想跟我去另外一个地方看看吗？

我说看什么呢？

他说我觉得你肯定会想要看的。

我说摩尔他们怎么办？

他说就在附近不远，一会儿我们就回来。

他不由分说拉着我就走。

燕青要带我去看的是一种表演，是一种妓女的表演，有各种可能的组合，做客人想看的任何姿势。

我曾经听说法国有些高级夜总会，客人可以加入妓女的表演，我自己倒是不想参加，但对看别人有种天生的好奇。

库布里克生前导演的最后一部片子《大开眼界》里，尼可·基得曼的梦境里就出现过那些艳情的场面：羽毛的掩饰，戴着面具，派对的氛围，俊男色女，陌生的挑逗气氛.....

我也经常做有关性的梦，有时候是和一些陌生人，有时和熟悉的亲人，有时候是自己爱的人。